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陆德海, 李学辰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吉安, 343009)

摘要: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 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 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 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 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关键词: 章学诚; 袁枚; 诗艺; 性情; 性灵; 清真

中图分类号: I206/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1-0125-06

章学诚一生对袁枚口诛笔伐, 不遗余力。究其原因, 研究者普遍认为, 章学诚与袁枚在学术观点上尤其是诗学思想方面并无严重分歧, 二者对当时学界风行的考据之风均感不满, 学术见解实有许多共通之处, 唯章氏以“纲常名教”衡量袁枚, 故而对袁枚大力批判丑诋。如钱钟书先生就说“实斋论学大义, 与随园说诗要指, 实如月之印潭, 土之就范, 无甚差异”, 但“实斋痛诋子才, 不遗余力”,^[1](261-262)]即认为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并非由于学术观点之争。后来论者亦多沿此思路探索章学诚批判袁枚的动机, 如谓章氏由“鄙薄袁之为人”“进而全盘否定其学术”^[2](13)], 章氏“对袁枚的攻讦已远远超出诗学, 更多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大加讨伐的”^[3](24)]。此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只是论者过分强调二者学术立场包括诗学思想之同, 却忽视了二家学术立场尤其是诗学思想的差异也是章学诚批判袁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事实。因此, 考察章、袁二人诗学思想之差异, 将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章学诚批判袁枚的原因, 并可由此窥见清中叶的才性论思想对当时学人的影响。

一

在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上, 章学诚、袁枚二人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是现今所谓“杂文学观”的代表, 主张“文以明道”, 要求文学能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效; 袁枚则颇为离经叛道, 闭口不谈温柔敦厚, 而标

举“性灵”, 把性情看做诗歌的第一要素, 具有明显的纯文学意识。然而, 这个差异在二人的具体言论中, 表现得并非判然分明, 尤其是章学诚的诗学思想很丰富复杂, 颇有与随园诗学似是而非之处, 若不详加甄别, 便很容易忽视其批判袁枚的学术动机。

章学诚诗学思想与随园诗学似是而非处主要有两点: 一是重视诗艺, 注重审美鉴赏, 反对片面讲究格律声韵等形式技巧; 二是重视言情, 推崇性灵。

章学诚虽主明道, 但不排斥文艺, 认为“道隐晦而难显, 故须文辞以达之。孔孟言道, 未尝离于文也”^[4](89)], 因此, 他不赞同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的态度, 说:

夫子教人博学于文, 而宋儒则曰: “玩物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 而宋儒则曰: “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 岂非末流良药石哉? 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 似见疾在脏腑, 遂欲并脏腑而去之。^[5](140)]

章学诚认为, 宋儒重道轻文的结果就是言而无文, 反而害道。章学诚对人们奉为文宗的韩愈并不以为然, 不承认韩愈为古文正宗, 但在论文道关系时, 章学诚转而有取韩愈, 说: “宋人讥韩子为因文见道, 然如宋人语录, 又岂可为文乎? 因文见道, 又复何害。”^[4](89)]宋人曾讥韩愈先文后道为“学倒了”, 然而, 章学诚却认为, 但能见道, 则无须厚此薄彼。章学诚的认识没有停留在此, 他又更进一步, 说“闲习文辞, 亦学以致道之一事”^[4](336)], 强调诗艺的掌握、淬炼, 不仅仅是

收稿日期: 2008-06-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7JC751003);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X0815)

作者简介: 陆德海(1974-), 男, 江苏淮阴人,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 李学辰(1979-), 女, 天津宝坻人,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

辞达的需要,其本身就是致道的必由途径,不可或缺。

基于上述认识,章学诚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特质。针对当时学者鄙薄辞章的倾向,他批评道:

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5](139)}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性理之燄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4](85)},章学诚所论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在重诗艺的文学观念下,实斋的诗学批评能够着眼于文学的审美因素,而摆脱头巾气与学究气。在《家书三》中,章学诚回忆道:“犹记二十岁时,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4](92)}在当时考据之风盛行的学术背景之下,章学诚不迷信吴注,而以祖父从审美鉴赏角度所作评论为是,说明他不乏文学鉴赏能力。注重“意味”,要求文章有“悦目娱心之适”“咏叹抑扬之致”,与袁枚说“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6](565)}相似。从文学审美构成因素的角度立论,体现出章学诚对诗艺及文学审美特征的重视。

然而,“闲习文辞”在章学诚看来,毕竟只是“学以致道之一事”,虽然不可或缺,却非人生实践的终极目的。因此,与袁枚相比,章学诚对于诗艺的重视显得有所保留,不像袁枚那样重视诗艺而落脚点在于天才与性情,章氏诗学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色彩。在《诗教下》中,章学诚说:

古诗去其音节铿锵,律诗去其声病对偶,且并去其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一切工艺之法,而令翻译者流,但取诗之意义,演为通俗语言,其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数者,而枵然一无所有,是工艺而非诗也。^{[4](111)}

从匡正神韵派、格调派等诗学理论的偏颇角度来看,章学诚认为诗艺不同于工艺,认为音节铿锵、声病对偶以及谋篇用事琢句炼字之类是“工艺”而非诗艺,这种诗学思想有其积极性的一面。然而,章氏所重之“意味”“咏叹抑扬之致”,却离不开他所贬斥的“工艺之法”,这就形成了其诗学本身的自相矛盾。在章学诚看来,只有考察“诗之意义”,才能判断诗与非诗,其诗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诗之意义”,这实际上又走上了宋儒重道轻文的老路。不过,章学诚虽然论道,但与道家之空言心性不同,章学诚更注重

实用性,所谓“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是雕龙谈天之文也。”^{[4](85)}他虽然并提“发明”“用世”,可重点还在于用世,有用斯为有道。欲求有用,则必须不为空言,言之有物。所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理》篇中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5](287)}道家所谓“道”,纯为心性之学,章学诚则认为,道应该融合事与理两方面内容。在《原道下》中,章学诚说:

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遯以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5](139)}

述事而理昭,正是史家通古今之变著述理想的发展,是其“六经皆史”说的具体表述。从其史学家的立场出发,章学诚眼中的诗艺就只不过是“所以达之之具”,其诗学思想中功利性的一面也就在此。

作为性灵诗学的倡导者,重视诗艺是袁枚的天职。王英志先生概括袁枚性灵说的内涵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7](67)}。在袁枚看来,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说:“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6](620)}这里所谓的“笔性灵”“笔性笨”,就不仅是指作家个性方面是否富有机趣,也包括对诗艺高下的讲求。与章学诚不同的是,章学诚诗学中的诗艺只是“所以达之之具”,而袁枚讲究诗艺,其目的就在诗艺本身,他把诗艺高下看做是作家有无性灵的重要标志。

与章学诚相似,袁枚亦有反对片面追求诗艺的言论,如对于同时的格调派诗学,袁枚就多有不满,但其批评的落脚点却是性情。如他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6](2)}

性情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要远甚于事理,与章学诚

所追求的述事而理昭相比, 袁枚要求诗艺的讲求需在性情的统辖之下, 这一诗学思想无疑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二

与随园诗学更相似的是, 实斋诗学亦重性情。章学诚认为, 就本质而言, “《诗》以导性情也”^{[5](185)}, “文指存乎咏叹, 取义近于比兴, 多或滔滔万言, 少或寥寥片语, 不必谐韵和声, 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雅》遗范也。”^{[5](79)}与袁枚一样, 章学诚也认为诗之所以为诗, 并不在于声韵格律等外在表现形式。经史著述、子书杂艺多有韵语成篇者, 然而“皆无当于诗人之义”, 真正的诗应当是继承比兴传统的性情摇曳之作。章学诚概括诗的特点为: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 而不知言情达志, 敷陈讽谕, 抑扬涵泳之文, 皆本于《诗》教。”^{[5](78)}判断诗与非诗的标准是“作者之意旨”, 而不可拘于形貌, 言情达志, 敷陈讽谕, 抑扬涵泳, 才是诗的应有之义而没有背离诗之根本。

袁枚认为, 诗歌应以表现诗人自我的性情为第一要义, “性情以外本无诗”^{[8](658)}, 把性情视为诗歌的灵魂。在古代诗论中, 诗“言志”与“缘情”多是对立的, “情”往往被看做一己之私情。而在袁枚看来, 两者实在就是一回事, 他说: “‘诗言志’, 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6](90)}而当时诗坛所津津乐道的声韵格调之类, 袁枚认为都不过是性情的附庸: “须知有性情, 便有格律; 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谁为之格? 谁为之律? 而今之谈格调者, 能出其范围否?”^{[6](2)}诗人若乏真性情, 即如袁枚评渔阳诗一样, “不过一良家女, 五官端正, 吐属清雅; 又能加宫中之膏沐, 熏海外之名香”, 可以倾动一时, 但却并非天仙化人、能够使人“心惊”“消魂”, 原因即在于王士禛“主修饰”, “不主性情”^{[6](80-81)}。

章、袁二人诗学的主要相同之处是对抒情言志的强调, 主要的分歧也就在此。同样强调抒情, 二人所谈的“情”的内涵却大相径庭, 有着本质的区别。

袁氏自称“最爱言情之作”^{[6](360)}, 无论是亲戚友朋之间的往来问答, 还是诗人登临游览、悼亡惜逝, 均属于袁枚所标举的“性情”的范围。种种性情之中, 袁氏所特重者, 乃在男女之情: “且夫诗者, 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 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 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 苏、李以夫妻喻友, 由来尚矣。”^{[8](1802)}他在《随园诗话》中收入了很多表现男女之情的诗作, 并引经据典来说明其所作所

为的合理性。袁枚还一再批评沈德潜的《清诗别裁集》不选王次回诗, 说: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 香奁绝调; 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 摈而不录; 何所见之狭也! 尝作书难之云: “《关雎》为《国风》之首, 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 亦存《郑》、《卫》; 公何独不选次回诗?” 沈亦无以答也。^{[6](15)}

袁枚的质难见于《再与沈大宗伯书》中:

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 以为艳体不足垂教, 仆又疑焉。夫《关雎》即艳诗也, 以求淑女之故, 至于展转反侧, 使文王生于今, 遇先生, 危矣哉! 《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阴阳夫妇, 艳诗之祖也。^{[8](1504)}

袁枚争论的关键不在于什么样的诗为“艳诗”, 而在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夫妻之情。为了证明“情所最先, 莫如男女”的观点, 袁枚不妨大胆断言儒家经典《关雎》为艳诗之祖, 提醒当世诗人不可数典忘祖。也正是这一行为, 引起了章学诚的极大不满, 痛斥袁氏为“倾邪之人”。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 集中在袁枚臆解经典以饰其说的行为上。在《诗话》篇中, 章学诚批评道:

声诗三百, 圣教所存, 千古名儒, 不闻异议。今乃丧心无忌, 敢侮圣言, 邪说猖狂, 骇人耳目。六义甚广, 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 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典训, 无不横征曲引, 以为导欲宣淫之具, 其罪可胜诛乎!^{[5](569)}

袁枚言论中的确颇多横征曲引“圣贤典训”处, 而又大胆地作出不同前人的解释, 自出新意, 章学诚的批评不为无据。论说诗方法, 袁枚“横征曲引”, 违背实事求是原则; 论其目的, 袁枚是为了文过饰非, 为其大张情欲之旗的淫邪行为寻求道义支撑。细按其实,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 焦点乃在于“言情妙于男女”这一点上。诗文中并非决不可表现男女之情, 章学诚认为, 诗中的男女之情, 若是出于寄托, 则无可非议, 因为“古人思君怀友, 多托男女殷情”, 因此, “《离骚》求女为真情, 则语无伦次; 《国风》溱、洧(应作‘国风《溱洧》’)为自述, 亦径直无味。作为拟托, 文情自深”^{[5](535)}。用这样的方法来解读作品, 则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男女之情都是合理的存在, 他说: “自两汉古辞, 迄于六朝杂拟, 并是骚客拟辞, 思人寄兴, 情虽托于儿女, 义实本于风人, 故其辞多谲宕, 不以男女酬答为嫌也。”^{[5](532)}章学诚把一切涉及男女之情的文学作品均看做出自伪托, 这就是为了文饰自己的观点而曲解古人了, 也没有深思即便伪托也多伪托男女之

情的原因何在。因此,在今人看来,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就显得比较庸腐,卫道气十足。

但是,过分强调从当今思想立场出发来看待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盛赞袁枚的思想解放而批判章学诚的封建卫道士立场,把章学诚对袁枚的这类批判统统视为人身攻击,也未免失察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妇学篇后》中批评袁枚说:“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俭,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则非圣无法矣。”^{[5](554)}这段论述才真正抓住随园性灵诗学的关键要害。袁枚性灵说大倡真性情固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难能可贵。然而,矫枉过正,不别性情之邪正,完全置社会伦理规范于罔顾,亦为一失。在袁枚看来,正常的男女之情如夫妻之情,与艳情并无区别,因此《随园诗话》中对伉俪情深、狎妓买妾、同性相恋等均表欣赏,不加别择。如袁枚为白居易写作忆妓诗多于忆民诗辩解道:“宋《蓉堂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关雎》一篇,文王展转反侧,何以不思王季、太王而忆淑女耶?”^{[6](16)}将《关雎》解为“艳诗”、把白居易忆妓视同文王忆淑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会激起思想比较正统的人的愤慨。章学诚斥为“丧心无忌”“邪说猖狂”并不为过,即便今天看来,袁枚所论亦属比拟不伦。

由上述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来看,章学诚虽然认为“言情达志”本于《诗》教,从而有取于“声情色采”,但他所标举的“情”,必须合乎教化,这正是二家诗学的最大分歧所在。

三

无论是对诗艺重视程度的不同,还是对性情的认识分野,都根源于章学诚与袁枚基于才性论而作出的不同的自我人生道路选择上。章学诚远绍浙东史学传统,欲成“专家”,袁枚则一意要入“文苑传”,正是身份认同的殊异,导致他们诗学思想的似是而非。

对于自身禀赋,袁枚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仆不敢自知天性所长,而颇自知天性所短。若笈注,若历律,若星经、地志,若词曲家言,非吾能者,决意绝之。犹恨其多爱而少弃也,学杜、韩,亦为元、白,好韩、柳,亦为徐、庾,汲汲顾影,如恐不及。方欲捐两骖以求其精。^{[8](1545)}

袁枚深知自己的擅场在于诗文,故而及早放弃考据之学,不与汉学家一争雄长,诗学方面,更认为汉学与文学势同水火。至于宋学,袁枚更认为,文人“都是道其所道”,不必依傍圣人之道,不必打着“明道”的幌子;儒者一则其所守之道“非待文章而后明”,再则其“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不必有文章,也根本不可能有文章。^{[8](1550)}这样,文人、学者既互不相妨,也毫无融会贯通的必要。对于“立身”问题看得如此通达,主要在于袁枚认为“艺苟精,虽承蝸画策亦传”^{[8](1545)},所以,他能够心无旁骛地从事诗文创作。从他一再催促告诫后学说“要知为诗人,为文人,谈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择,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也”^{[8](1546)},可以看出,对于文人身份的认同,袁枚是何等的自觉。从厕身文苑的立场出发,袁枚必然要反翁方纲、姚鼐等人之所为而行之,将考据之学从“文苑”中清除出去,以维护诗文的纯洁性,断言“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各有资性,两者断不能兼”^{[8](1766)},从而提出其诗学核心“性灵说”,说:“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6](146)}诗人中惟李商隐多用典故,那也是“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8](1766)},仍然以“才情”为第一位。

章学诚与袁枚一样,也注意到人之秉性有所不同,义理、考据、文辞与人之才性各有对应,学者当有所偏重。他说:

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词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主于学,词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虽童蒙可与入德,又知斯道之不远人矣。^{[4](85)}

自辨才性之所长,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性。所以,章学诚又说:“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5](166)}章学诚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见前人所未到处”^{[4](92)},义理的兴趣更盛于考据与诗文。然而,与袁枚只讲专精不同,章学诚提倡博而能精,认为学者应根据自己才性,扬长而不避短,以求博雅:“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

必求心得, 业必贵于专精, 类必要于扩充, 道必抵于全量, 性情喻于忧喜愤乐, 理势达于穷变通久, 博而不杂, 约而不漏, 庶几学术醇固, 而于守先待后之道, 如或将见之矣。”^{[5](166)}因此, 与袁枚重视作家主体的性灵诗学不同, 章学诚更重学问, 对于袁枚尊“作”抑“述”的纯艺术论调, 章学诚的批评说: “学问成家, 则发挥而为文辞, 证实而为考据。比如人身, 学问其神智也, 文辞其肌肤也, 考据其骸骨也, 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著述可随学问而各自名家, 别无所谓考据家与著述家也。鄙俗之夫, 不知著述随学问以名家, 辄以私意妄分为考据家、著述家, 而又私心妄议为著述家终胜于考据家。是直见人具体, 不知其有神智, 而妄别人有骸骨家与肌肤家, 又谓肌肤家之终胜骸骨家也。”^{[5](570)}袁枚重天才, 故而重视“形而上”的著作(其实是创作), 而以“性灵”为标的; 章学诚重学问以成家, 一意发明“比事属辞”的著述传统, 故其诗学的最高标准为“清真”。

章学诚拈出“清真”一词作为诗文标准, 本有与袁枚性灵说对抗的意思:

昔李白论诗, 贵于清真, 此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 故至今悬功令焉。清真者, 学问有得于中, 而以诗文抒写其所见, 无意工辞, 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彼方视学问为仇讐, 而益以胸怀之鄙俗, 是质已丧, 而文无可附矣。^{[5](569)}

袁枚论诗, 认为“凡诗之传者, 都是性灵, 不关堆垛”; 论文则说“古文之道, 形而上, 纯以神行, 虽多读书, 不得妄有摭拾”“古文家似水, 非翻空不能见长”^{[8](1800)}, 正是章学诚所谓“视学问为仇讐”。章学诚一再讥讽袁枚为“不学之徒”, 虽然有些言过其实, 但袁氏在论及诗与学的关系时, 其主张却往往是导致人们不学, 如论及经史与诗文的关系时, 袁枚说: “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 犹之有厅堂大厦, 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 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 是皆不可偏废。”^{[6](332)}持论貌似公允执中, 而揆之袁氏一生行事, 优游享乐半生, 平素所重, 尤在“园榭之乐”而非正屋高堂。又如以下所论: “诗境最宽, 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 穷老尽气, 而不能得其阃奥者; 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 偶有一二句, 虽李、杜复生, 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 必知此二义, 而后能求诗于书中, 得诗于书外。”^{[6](88)}袁氏本意应该不是主张人们不必读书, 但是, 既然读书破万卷竟无所得, 而妇人女子、村氓浅学的随意吟唱却有可能胜过李、杜之作, 那么, 学有何益? 不学何非? 立论如此, 招致章学诚的“不学”“小家”之讥,

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袁氏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 他有一部分作品流于浮滑流易, 根源即在于此。章学诚以清真与性灵相较, 不可谓无识。

参以章氏在《乙卯札记》中所论: “余论文之要, 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 求于为文之旨, 所谓言之有物, 非苟为文是也; 清则主于文之气体, 所谓读《易》如无《书》, 读《书》如无《诗》, 一例之言, 不可有所夹杂是也。”^{[4](377)}则章学诚所谓“清”, 主要指诗文风格的纯而不杂, 所谓“真”, 指心有所得而言之有物, 是对内容的要求。比较而言, 章学诚对“真”的阐释更为充分, 体现出其学者的本色。章学诚要求融会贯通义理、考据和文辞, 首先是义理、考据统一体现为学问, 其品格为“真”: “论文以清真为训。清之为言, 不杂也; 真之为言实有所得而著于言也。清则就文而论; 真则未论文, 而先言学问也。”^{[4](369)}按章学诚的说法, “辞章主于才”而“清”为气不杂, 才、学、识之间的关系是: “识生于心也, 才出于气也。学也者, 凝心以养气, 炼识以成才者也。”^{[5](278)}才气终究建立在学识的基础之上, 简而言之, “清真”的要义在于“真”, 惟真而后能清。文人之文的要害就在于学识浅陋, “清”或有之, “真”则难得。

章学诚主张的“清”与袁枚标榜的“灵”之间并无抵牾, 而“真”与“性情”则分道扬镳。章学诚所谓“真”并非指性情之“真”, 而是作者由学问而来的真知灼见, 强调的是“识”, 体现出学者的本色。因此, 尽管他承认“情”为诗之要义, 而一旦面临情感与学识的取舍时, 学者的智识主义倾向就显露无遗了。在上引《诗话》论“清真”一段文中, 章氏不仅讥讽袁枚“视学问为仇讐”, 还于文中自注道“毋论诗文, 皆须学问, 空言性情, 毕竟小家”, 揭示了两家论诗的主要分歧所在, 实际是学者与文人身份的不同。章学诚本人于此认识很清, 他区分“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不同说:

文人之文, 与著述之文, 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 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 必用锦绅玉佩, 彼行礼者, 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 未尝习礼, 惟藉制锦攻玉以为功, 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 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 而议著述之文辞, 如以锦工玉工, 议庙堂之礼典也。^{[5](489)}

也就是说, 学者可以因人成事, 即“著书之旨, 本以删述为能事”^{[5](426)}, 著述笔法则“记事记言, 因袭成文, 原有点窜涂改之法”^{[5](497)}, 故而词不必己出, 惟“比事”所需; 文人之职本如工匠, 故决不可冒他人之功。说得更明白点, 就是“文士撰文, 惟恐不自己出; 史家

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4](125)}，著述之文比事属辞，只需做到“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5](508)}即可，而文人之文则撰文之前，先有立意，不是“文欲如其人”，反而是“事欲如其人(文?)”，是为“削趾适履”^{[5](505)}“徇于文辞”，即使叙事之作，目的“亦出辞章之善”。章学诚记载了一件趣事，颇能反映“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行文思路的不同：

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鹳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焚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5](508-509)}

史家重在史识，因《猛省》“可以教孝”，故而采摭入篇，而文家所重，则惟在体现作意的篇章之法，这就是“比事属辞”的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之间的区别。文人之文辞必己出，故而必须重视主观之“性灵”，而反对“堆垛”“摭拾”，也更重视表现对象的情感内

涵；著述之文实事求是，要求据万事万物之当然以求其所以然，故而必以学识为先。所以，论诗艺，袁枚要求笔性灵，章学诚则时以工艺视之；论性情，袁枚惟在其真，章学诚则欲申之以理、约之以法，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是章学诚与袁枚诗学思想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 申屠炉明. 论章学诚对袁枚的学术评价[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0, (3): 13-17.
- [3] 王英志. 袁枚于乾嘉诗坛的影响[J]. 扬州大学学报, 2000, (3): 20-25.
- [4] 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5]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6] 袁枚. 随园诗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 [7] 王英志. 袁枚与清代诗学批评[J]. 文艺研究, 2001, (6): 57-66.
- [8] 袁枚. 小仓山房诗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Difference of the poetical esthetics of Zhang Xuecheng's and Yuan Mei's

LU Dehai, LI Xuechen

(Literature Department,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Zhang Xuecheng's criticism to Yuan Mei wa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etical esthetics. Zhang Xuecheng's poetical esthetics gave high value on the poetical skills and sentiment, which just assimilated to Yuan Mei's esthetics named as personality esthetics. The final goal of Zhang Xuecheng's poetical esthetics was the poem meanings. Although he advocated the sentiment, he opposed Yuan Mei's opinions on love. These differences are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self-status approval based on the talents' theory.

Key Words: Zhang Xuecheng; Yuan Mei; poetical skills; talent and sentiment; personality; pure and clear style

[编辑: 苏慧]